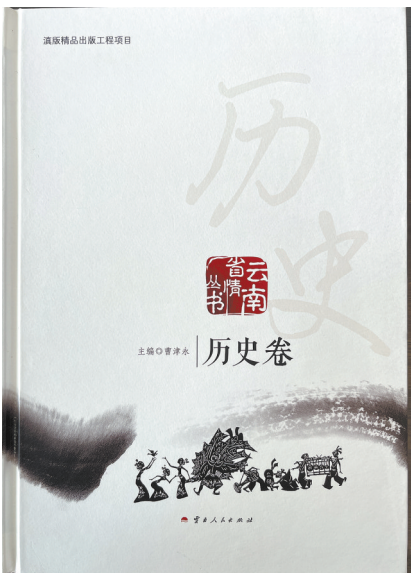


云南文史

编者按

以史为鉴，以文传薪。云南的历史，是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历史，是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为了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云南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独特价值，读懂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坚贞不拔、包容开放的精神内核。我们联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对云南历史进行特别策划，运用新的历史发展主线、叙事模式，力求展示好真实立体的云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战略构想和部署，对历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研究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创造、书写的五千年灿烂文明史，是当代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担当。云南地处祖国西南，外连越老缅等东南亚、南亚国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云南生态多样，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以来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陆路桥梁。系统梳理云南历史对推进中华文明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记录云南历史的专篇，从《史记·西南夷列传》始，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亦多有志书。自方国瑜先生1954年撰著《云南民族史讲义》以来，云南著名史学家马曜、尤中、林超民、何耀华等不断深耕云南地方史，先后出版《云南历史大事记》（1975）、《云南地方史学习纲要》（1982）、《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83）、《云南简史》（1984）、《中国西南民族史》（1985）、《云南地方沿革史》（1990）、《云南通史》（2011）等著作，大大推动了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学习和普及。《云南省情丛书——历史卷》是遵循云南由地方不断融入多民族统一国家治理体系及其发展、云南多民族融汇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两大历史发展主线，基于云南的省情特点及对祖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在前人关于云南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的新尝试和新探索。

一、不断纳入国家一体化治理是云南历史发展的主线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整体的一部分。云南历史发展与祖国的历史发展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早在距今170万年前，云南就有古人类生息繁衍。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原住民在发展中不断分化，并与南下的羌人、东来的越人等融合，形成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滇、劳漫、靡莫、句町、哀牢、进桑等数十个族名与部族王国名称同一的王国。秦汉时期，秦始皇在云南开道，置吏以主之。《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汉朝承秦制，汉武帝时，从建元年间到元封以后，经过30多年的开拓经营，在经济文化长期交流、密切联系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招徕与武力征讨，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犍为郡（前135年）、牂牁郡（前111年）。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兵临滇池，滇王尝羌“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武帝于此设立益州郡，郡治在滇池县（今云南晋宁），赐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同时派遣都守进行管理。中央王朝在承认地方首领部分权位（力）的前提下，将云南核心区域正式纳入国家版图

与行政管理体系，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郡县制度在云南的全面确立，为云南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其后，历经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的经营，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不断汲取中原典章制度，形成了“虽自治而常怀内向”的政治传统。至元朝设立云南行省，清代大力推行“改土归流”，中央政府的直接治理层层深入，最终使云南的行政、法律与经济体系与内地浑然一体，完成了从羁縻边地到国家行省的根本性转变。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设云南省，置1市（昆明）、112个县及16个设治局，分别由昭通、曲靖等13个行政督察区进行行政监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2月24日，云南全境解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自公元前109年益州郡设置到今天，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时代如何变迁，云南始终是中国历史整体的一部分，云南历史的发展，统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之中，不断熔铸为国家治理整体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云南历史发展的主线。

二、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家庭是云南历史发展的主脉

中华民族是一个经过长期互动交流，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在地理、政治、历史、文化与精神上均具有高度共同性与认同感的共同体。云南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远古至秦汉时期，云南是氐羌（自北南下）、百越（自东南西进）、百濮（本地及西南来）三大族系交汇的舞台。不同的族群在云南这片热土交融演化。史前时代云南文化的多样性及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交流，说明还在遥远的古代，云南各民族的先民，就与内地居民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史前文明。

两汉时中央王朝以应征作战、军屯及将“死罪及奸豪”流放实边等多种方式，把内地汉族人民大批移入云南。各民族错杂而居，水乳交融，并逐渐融合于“夷人”。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中原政权对西南边疆的控制相对松弛，中央王朝“因俗而治”的羁縻怀柔政策在云南得到了广泛推行，南中大姓推动夷汉融合，以地方豪族为纽带，呈现“夷汉杂糅”的初步态势，成为中华文明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诏的发展加速了境内族群的流动与重组，通过战争迁徙，洱海地区居民与滇东、滇西各族交错杂居；大理国时期，云南各民族呈现“坝区农耕—山区畜牧”的互补共生格局。明代移民规模空前，超过百万的汉族军民以屯田方式遍布云南坝区和交通沿线，使得汉族人口首次在南云南占据相对多数，彻底改变了云南“夷多汉少”的民族分布格局，并深刻影响了经济生活和文景观，形成了民族融合新局面。清代持续的内地移民（包括矿工、商贾）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态势。在此过程中，内地移民与云南本土世居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立体分布，这种地理空间上的交错，为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抗战时期，云南各族儿女共同修建战略通道、踊跃参军、支援前线，“滇军”威名远扬。这种共赴国难的集体实践和记忆，将各族群的利益和情感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紧紧捆绑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体系。

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稳定的根基，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的保障，民族融合是国家统一牢不可破的基石。自古以来贯穿云南发展始终的民族互动交流，既是中央王朝持续不断的经营与拓展，也是云南各民族参与、适应、吸收并丰富中华文明的过程。通过政治制度的整合、经济生活的联系、文化教育的浸润以及近代民族国家危难中的命运与共，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

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三、云南为中国历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部云南史，就是云南各族人民在云岭大地生生不息、生存发展的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族人民在技术、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的发展，近代以来，面对侵略，各民族共同抵御外辱，维护边疆稳定，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历史时期，云南形成了以坝区稻作和山区畜牧为主的多元生计体系。上古时期，云南先民驯化野生稻，使云南成为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濮人系的先民培育出栽培型茶树，奠定茶文化根基。青铜时代，云南已掌握高超的铜锡合金技术，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工艺精湛、造型写实，展现了独具特色的古滇文明。铜鼓文化的传播及“云白铜”远销海外，表明云南早期已承担区域技术与文化交流的枢纽角色。魏晋至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在吸收中原农耕技术的同时，发展畜牧经济，大理马成为宋朝重要战马来源。连接中原、吐蕃、东南亚与印度的“茶马古道”日渐活跃，云南作为“亚洲腹地十字路口”的地位凸显。元明清时期，云南逐步从经济“边缘”走向国家“支撑”地位。明清两代，云南银、铜开采规模空前，明代滇银产量占全国半数以上，清代东川铜产量占全国八成以上，“滇铜京运”成为维系国家金融稳定的百年大政。

近代以来，云南在西方冲击与民族危机中成为开放前沿与救亡图存的关键支点。滇越铁路将云南卷入全球现代化进程，催生了首批产业工人和近代企业。抗战期间，滇缅公路与“驼峰航线”作为几乎仅存的国际通道，以其工程奇迹支撑起全国抗战物资供应，战略意义重大。云南亦屡开政治风气之先：重九起义使其较早脱离清廷，护国运动首举共和义旗；抗战时西南联大迁驻昆明，在艰困中保存并光大学术命脉，为民族延续了教育与科学的火种。近代云南在交通革新、共和革命与文明传承等方面，贡献卓著，彪炳史册。

历史时期，云南各族人民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文化，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南边陲”的云南，以其独特的方式深刻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四、开放联通是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

云南的地理与区位特点，使其成为中华文化交融、中外文明交汇的重要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云南就与黄河长江流域及东南亚存在文化联系。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兼具地方特色、中原文化元素及南亚艺术影响，贮贝器上的图像反映出滇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滇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印度洋海贝，证明当时已存在与沿海地区的贸易往来。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云南便是中印文明交往的前沿，民间开通的“蜀身毒道”成为早期国际通道之一。

三国至唐宋时期，云南继续扩展交通网，不仅成为西南边疆的枢纽，也成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南、连通域外的重要通道。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以及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的崛起，云南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重要枢纽。南诏向东学习唐朝制度文化，引入儒家经典、佛教典籍和官僚体系；向西与吐蕃保持政治联姻和军事同盟；向南征讨骠国（今缅甸地区），将其纳入势力范围，南诏都城太和

城、阳苴咩城成为国际性的都市，吸引着各地的商人、僧侣和使节。大理国将佛教文化交流推向高潮，使云南成为中国与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站。元明清时期，修建连接省内各地并通往四川、广西和缅甸赤、驿道网络，明朝在云南西南境外广设土司机构，其政治影响力覆盖今缅甸大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地区，形成了著名的“贡象道路”，并逐渐演变为云南重要的出海贸易通道。清代，尽管云南的对外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滇缅贸易急速发展、日益昌盛。但大量普洱茶通过茶马古道销往中国西藏、尼泊尔、印度，并进入俄罗斯和欧洲市场，云南仍然在全球白银贸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云南的蒙自、腾冲等城镇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口岸，出现了“商贾云集，马帮不绝”的繁荣景象。云南从区域性开放枢纽转变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

近代以来，云南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从被迫接受到主动拓展的历程。中法战争后蒙自、河口等地被迫开埠，1910年通车的滇越铁路不仅推动了沿线城镇的现代化，也使其成为输入西方技术、制度与思想的重要通道。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与“驼峰航线”更将云南提升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略枢纽。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的开放被赋予新时代的内涵。从沿边开放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云南正从开放“末梢”转向“前沿”。中老铁路通车、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中国—南亚博览会落户昆明等举措，共同推动云南形成陆海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云南的历史发展始终贯穿着联通内外的开放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塑造了云南独特的文化身份，也使其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全球的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

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底色

云南因地理位置、巨大高差及两大洋环流影响，形成立体气候与多样生境，涵盖从热带到高山冰缘、从湿润到干旱的各类生态系统，堪称地球生态系统的缩影。其动植物种类丰富度、特有率及古老性均居全国前列。独特的地理气候使云南成为历史上各民族迁徙、交融的通道。在长期适应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各民族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始终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平衡，绿色发展成为云南历史的重要底色。

云南先民从采集野生植物逐步发展出种植与畜牧结合的农业形态。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物种与驯化技术的传入，粮食种植与动物饲养体系趋于成熟，植物利用兼具观赏与药用功能，家畜以狗、猪为主。滇池地区碳化稻谷遗存表明，青铜时代的云南已掌握适应当地气候的水稻种植技术。考古研究显示，农业并未走向单一垦殖，而是与采集、渔猎、畜牧并存，形成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复合型生计系统，“万物有灵”的生态观念在当时居于主导地位。

三国至唐宋时期，云南的人类活动

与环境的互动从局部适配逐步走向系统性干预。坝区逐渐成为人类活动集中的区域，铁质农具的开发及中原耕作技术的传入，使得坝区的耕作强度不断增大。山区由“虎狼”居住之地，逐渐开发出梯田和台地，矿产资源开采逐渐增加并走向规模化，对区域环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扰动，稻麦复种制得以形成并推广，复合型农业生态系统初现雏形，有效维护了农业生态的稳定。元明时期，大量移民进入，伴随着坝区人口激增，农业开发的强度和广度都在大大拓展。改土归流的推进，导致传统稳定的山坝分异发展模式被打破，移民开发及先进农耕技术进入山区，带来了山区空前的环境压力，马铃薯、玉米等美洲作物的引进，打破了南方山区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成为局部生态失衡的重要表征。同时，自元代开始至清代，中央王朝在云南的矿产开发包括铜矿、银矿、锡矿等规模化开采日渐发展，逐渐引发新问题，带来新的挑战，清代滇东北铜矿业中，当地130年间森林覆盖率下降20%，且矿业开发使当地聚集大量人口，为了生产生活毁林开荒，垦殖农田，使滇东很快从一个人口稀少的较少开发地区，成为云南人口密度较高、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成为清代中叶以来长江上游输沙量的主要来源地区之一。与此同时，云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格局基本成型，各民族融合儒家思想与实践智慧，形成了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的生态文化体系，在生态文化体系上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新局面。

近代以来，云南的人与环境互动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大规模开发与战乱给生态环境带来严峻挑战，橡胶、烟草等经济作物的引种也对传统生态平衡形成冲击。与此同时，西方现代生态知识与农业技术传入云南，推动生态观念与治理方式发生转变。农业领域引入灾害防治与综合治理技术；城市方面，政府以“园林都市”理念规划昆明，并出台《云南森林章程》等系列林业管理制度，以国家主导的现代管理模式积极干预生态保护，对人与自然共生进行积极干预。

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云南各民族基于顺天应时、敬畏自然、合理利用等生存理念与智慧，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适应环境的生计模式，并由此衍化为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独特性的民族生态文化。这是云南成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核心区的历史积淀。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态文化是促进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思想宝库，为云南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打下了深厚的历史根基，有利于推动云南形成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高度耦合的人与自然和谐之道，从而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样板。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中多有参考引用方国瑜、马曜、尤中、林超民、何耀华等诸位先生的观点，由于报刊文章体例所限，无法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谢！】

云南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和特点

基于《云南省情丛书——历史卷》的认识

曹津永

从永昌郡城到永昌府城

保山历史古城的变迁

蒋开磊

保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是云南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保山历史上曾是哀牢国首邑，西汉时设不韦县、东汉时设永昌郡、南诏大理国时期设永昌节度、元代设大理金齿宣慰司都元帅府、明清以来设永昌府，保山历史古城的变迁，全程见证了滇西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繁荣与沉浮，见证了保山各民族在不同时期的交流与文化融合。

不韦县治

关于保山城池的记载，较早出现在不韦县设治时期。不韦县，古代地名，位于今保山市隆阳区东北部金鸡村，其属西汉时期首设的郡县故址。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因徙秦朝吕不韦之裔、南越国丞相吕嘉宗族子弟发配充军于此，而设治并得名。史载：“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置不韦县。”至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永昌郡时，郡城城址移至保山东河西侧的诸葛营凤凰村，金鸡村不韦县县城城址依然保留，直至南朝后因兵燹而废。

历史上，不韦县遗址坐落在保山坝东北边缘凤溪山下，是澜沧江以西广阔坝子上出现最早的城市，也是汉武帝设治的最为偏远的县城之一。其位置地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是保山中原文化的首个发祥地，是后世永昌文化的起点和摇篮。它一度成为当地重

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给西南边疆特别是保山地区带来了较早的中原文化，是保山中原文化融合的最早聚集地和发祥地。现存遗址有点将台、季平（吕凯字号）街、文昌宫、古戏台等。

永昌郡治

关于永昌郡设治，《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属唐、不韦、比苏、叶榆、邪龙、云南六县，合为八县，置永昌郡”。又据《续汉书·郡国志》载：当时，永昌郡八县共有20多万户，人口189万多人，在东汉105个郡国中为第二大郡。而其疆域则“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六百里”，即从今约大理一带向西抵腾冲、德宏一带，向南直达临沧、普洱、版纳等地区。史载：“孝章帝建初元年（76年）……蛮夷陈纵等及哀牢王类牢反，攻屠唐城，永昌太守王寻奔叶榆。”“次年（77年）汉朝讨平之，都徙治不韦。”由此得出结论，永昌郡于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迁郡治至不韦（今保山坝），并建郡城于今保山城南四公里处诸葛营村东侧，此址直至晋代还一直沿用。永昌郡设治在不韦县共计222年，元康九年（299年），吕凯之裔吕祥之子为永昌郡太守时，“值南夷作乱，

闻、濮反”，郡治“乃南移永寿（今耿马）。其后又设治于永寿县（今耿马）43年，整个郡治史共计265年。

今保山市城南的汉晋古城址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其坐落于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街南端3000米处，现为保山市隆阳区兰城办事处汉晋社区，该城址始建于东汉（公元25—220年）时期，遗址为城墙旧址，即以今之所见的四周高坎田埂为标志，东西长365米，南北宽310米，呈四边形，占地为11.32万平方米，城西有外廊，并有大量汉晋时期的几何纹砖、布纹瓦、卷云纹瓦等遗物出土。如出土“建安四年造作”（东汉末期公元199年）；“延熙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亡”（三国蜀汉末期公元253年）；“元康四年造作”（西晋初期公元294年）；“□□二年造”“长乐寿未央”和“五铢”“羊羊”等铭纹砖。其中分布最广的是瓦砾，有的堆积层厚达50—100厘米。这些板瓦有三分瓦，有的长达46厘米，宽37厘米，厚2厘米。筒瓦则为二分瓦，有的长达40厘米，直径宽15厘米，厚2厘米。筒瓦有搭榫，子口直径约4厘米。从这些出土的砖瓦纪念文字和图案考察来看，这一古城在当时应该是一座辉煌的边地古城。2001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永昌府治

自唐南诏时期起，保山地区的行政中心从原永昌郡城址迁至地势更高的太

保山下。南诏王皮逻阁于天宝二年（743年）在此修筑土城，称为拓榆城。其后历经大理国（设永昌节度/府）、元代（设永昌府）直至明清（设永昌府），此处始终为区域行政中心。

明代初年，原拓榆城址因旧基重修，指挥使李观在其旧址上支砌的砖石，增置楼阁，并于城与主城连为一体，纳入保山城内。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永昌城，城墙总长13里又14步，“凡八门，东曰升阳；南曰镇南；龙泉；西曰安定、永镇；北曰仁寿、通华、拱北”。城周各设角楼、炮楼和钟鼓楼，墙外有护壕，以吊桥沟通内外。至此，一座规模宏大、设施完备的砖石城池最终形成。坊间尚有传说谓，当时仁寿门位于西山脚偏坡上的城墙屡建屡塌，朱元璋的马车、当时的永昌都指挥使胡渊遂上书洪武皇帝，请求指点，朱元璋在图纸上指点勾画之后，此城乃成。因而此段城墙便有了一个极为洪亮的名字“御笔杆”。

自明初永昌府府城以汉式砖城筑成后，因战乱与焚毁等原因曾历经多次重修。史载，嘉靖三十八年（1549年），副使韩廷伟，增筑西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知府华存礼浚濬补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总兵戎化泰，知府罗纶，知县程奕同修；五十六年（1717年），知县冉琪重修。雍正四年（1726

年），东门失火重修。乾隆四年（1739年），知县张福起，详请动帑重修；二十年（1755年），知县邵霖捐修。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知府刘彰宽，捐俸重修。道光四年（1824年），知府陈廷禧，率民挖四围濠池。咸丰四年（1854年），知府彭松毓，详请筹捐浚其濠。同治十年（1871年），官兵围攻克复城已多颓圯，池多壅塞未修。

永昌古城现存遗迹主要有城墙、仁寿门、龙泉门、安定门、基址及大量的城砖等物。城墙主要存于太保山上，北起仁寿门上行太保山，东山顶一圈转下至龙泉门基址，总长2243米。墙体以砖石筑砌，夯土填心，一般残高3至5米，厚8至12米不等。仁寿门位于太保山脚北侧，用砖石支砌，现存门基长30米，宽12米，高5米，基下门洞保存完好，尚可通行人畜。龙泉门位于山脚南侧，规制与仁寿门相当，但台基已被拆除，仅剩门洞两壁。安定门位于山顶东南侧，为20世纪80年代重建，门洞以砖石支砌，上覆戏楼改建。

总体上看，永昌府城是滇西地区存续时间较长的历史文化名城。它肇建于唐南诏时期，初期为羌人风格的土木城建造样式。至明代以后，就一直按汉式传统砖墙城池设计，依山环水，北进南出，八门建造，体现了其对外开放与对内防御的基本功能。它同时也见证了历史上的各次兵戎纷争与商贸往来，见证了历史的进步与民族的融合。

（作者单位：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